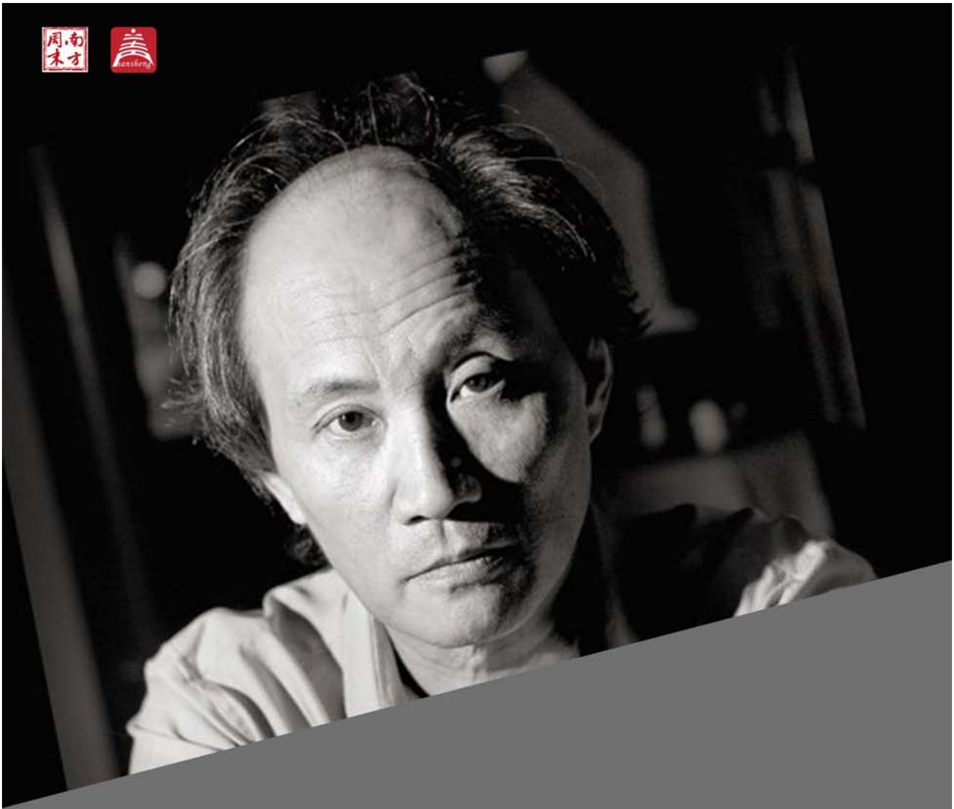


金宇澄
好作家的秘密

南方周末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金宇澄：好作家的秘密（中国故事）

作者:南方周末

ISBN:978798757788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茅盾文学奖，书单还是榜单？

2015年8月16日午后，作家金宇澄的手机热闹得不同寻常。

就在那段时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评奖办公室在中国作家网上公布了获奖作家、评委组成和实名投票等信息。与上一届相仿，六轮投票，五部作品获奖，按照得票数的多寡，获奖的包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以及苏童的《黄雀记》。

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举办一届，每位获奖者的奖金目前高达50万元。这届茅盾文学奖有252篇长篇小说参评，比上届评奖多出来74部。

得奖后，苏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最近疲累万分”，李佩甫则“扭了腰”。

读书是个体力活

2015年5月6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接到了一通电话——邀请她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随后发来的邀请函中，包括诸多保密协议，譬如接到通知后不能参加参选作品的研讨活动，不能再对参选作品发表相关看法，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与评奖有关的文字，未来不能透露评审过程的具体细节。

这是张莉第一次担任茅奖评委。按照评奖条例，评委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协的聘请和相关机构的推荐，两部分人员分别为30人和31人。

5月6日到7月30日是第一阶段评审。评奖办公室要求，评委要在前期阅读基础上按参选篇目逐一阅读，进组之前要把参选的252部作品读完——平均每天要看3部作品。

“第五届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其初版字数未达13万字而被拿下。”茅奖评委、《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入围作品要求达到13万字以上，这意味着，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要达到40万字。一些重要作品评委们可能已经阅读过，打个对折，每位评委每天的阅读量也有20万字。

收到入围书单后，茅奖评委、吉林省作协主席张未民开始上网订购。按照“条例”，评委应当是“关注和了解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年龄一般不

超过70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

这两个月时间里，读书成了体力活。“重要的作品重看一遍。名气小的作品看得比较粗，最后也会看到它们离茅奖的标准确实有一定的距离。”茅奖评委陈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7月29日到8月16日，评委们被集中在北京西山的某处校园。这段时间里，他们不能走远，每天主要做几件事：阅读、讨论，吃自助餐，业余活动主要是在附近散步、登山。

投票共六轮，252部作品中选出80部之后，再逐步缩小至40部、30部、20部和10部，最后一轮从10部作品中选出最终的5部获奖作品。

评委实际上一共有62位，按照规定，评委会主任铁凝不参加投票，因此总票数为61票。不过铁凝出席每一轮的投票会议，三个组的讨论则轮流参加。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大体延续了第八届的评委制度，评委会同为62人——评委实名投票并对外公开。与第八届的重要不同在于，前五轮投票情况不再在媒体公布，评委名单也一直保密，直到奖项揭晓。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员会副主任李敬泽表示，这种变化是为了“评奖过程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环境下进行”。

投票评出最后五部作品之前，评委们在讨论中亮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五部。听取别人的意见之后，他们还有调整自己选票的机会。在陈晓明的印象里，那时局势实际上已经明朗。从组委会公布的投票结果看，第五名《黄雀记》与第六名阎真的《活着之上》之间，票数差距明显。

茅盾文学奖的品味保守，变与不变，是争议的另一来源。

杨庆祥被问过许多次关于变化的问题。他不认为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能变化到什么地方去？你说《红楼梦》，问一千年它还是伟大的作品，你说它怎么变呢？”

他把格非和苏童获奖看做茅盾文学奖多元化的标志。两位作家最初以先锋小说闻名，“虽然他们的作品现在也是在写现实，但是不算严格意义上茅盾文学奖最初规定的社会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每一代评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成长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文学观念肯定存在差异，评委的更新换代肯定会导致茅奖发生变化，因为评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杨庆祥是本届评委中唯一一位“80后”。但参选的80后作家并不少。张莉记得，评奖过程中，在饭桌上或电梯里，她常听到评委们对年轻作家作品的赞叹。“几乎每一位评委都认识到新一代作家在崛起这一事实。”

“在评审工作第一次讨论会上，我特别提到扶持文学新人与多样化问题。《南方有令秧》《我们家》《天体悬浮》《耶路撒冷》《镜子里的父亲》《认罪书》等，尤其《南方有令秧》给我惊艳之感。”谈到年轻作家，评委张燕玲不无遗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要看到文学的善意”

作家王蒙81岁，这次是他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刚开始创作《这边风景》时，王蒙不到40岁，离开北京，正在新疆寻找新生活。等这部尘封多年的小说出版，王蒙79岁。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

杨庆祥对王蒙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从事着“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特别优雅的传统”。

从1982年茅盾文学奖初评开始，王蒙就成了常客，但最后总与奖项失之交臂。

茅奖条例规定参评作品“于评奖年限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初版于1987年的《活动变人形》，以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本参评第六届茅奖，张燕玲参与过此届初终评全过程，大部分评委都相当喜欢此书，“我也认为是王蒙至今最好的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以变人形的方式生动透彻地表现出来，有一种忧郁之美。但它不符合茅奖规定的年度内‘首次成书出版’”。

张燕玲清楚记得2004年在马坡文学会馆终评时，评委普遍认为经初评26部入围作品中，初版不在评选年度内的四部作品——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是遗珠之憾，并经全体21位评委讨论和投票表决，均未获得通过。

“我们要看到文学的善意在增加，我们肯定了历史，肯定了王蒙的地位，也肯定了这部作品在当今的意义。”评委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边风景》获奖之后，王蒙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好事不会觉得太晚。”在获奖名单上，他获得的票数排在第二位。

获得票数最多的是格非。他的获奖之路也颇为曲折。从1990年代开始，格

非就想写关于百年历史的作品，起初设想为一部，后来顾及到体量和结构，就转为三部曲。

第七、八届茅盾文学奖，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被出版社推荐参评，那时第三部还未完成。但按照评奖条例，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这两部作品最终未能入围。

到了第九届茅奖，“三部曲”完成了，成功参选，但在公示期中，仍被质疑重复参评。李敬泽回应，多卷本作品“评奖年度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指全书最终完成的出版时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出版，意味着格非设想中的历史小说完成，在出版时间和作品类型上符合评奖的规定。

《繁花》也是一部争议作品——上海的不少批评家认为，《繁花》的书写不能代表他们心目中的上海。

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选择《繁花》，金宇澄觉得非常感动。金宇澄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到“孤独”。用上海方言写作，他既想突出语言的特色，又要避免阅读的障碍，“没有人这么做，我等于很孤独地去做这件事情”。

他用改良的上海方言，描绘不同家庭背景的三个当代上海人的交往，时间跨度约三十年，总共牵扯到一百多个人物。杨庆祥把《繁花》视为“特别异质性”的作品，而金宇澄“对丰富汉语的写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注，吃喝拉撒睡这样的民生视角，《繁花》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李泽厚说当代叫吃饭哲学，道理是一样的。”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文化评论者侯虹斌的观点更加直接：“茅奖需要《繁花》，更甚于《繁花》需要茅奖。”

在《黄雀记》中，苏童继续写作自己的香椿街故事。杨庆祥把《黄雀记》称为苏童完成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实现了苏童的写作理想”。

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与之前的《羊的门》《城的灯》合称“中原三部曲”。亲历这三部作品参选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张燕玲认为，《生命册》的“生命质地、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都是李佩甫最好的。

金宇澄还记得，“文革”结束时，所有人都在看小说，菜市场卖菜的，邮递员，女孩子，男孩子，任何工作的人都在看托尔斯泰。“大家都排队去买书，尤其是上海，都是排长队。”

“对于真正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茅奖只是一个书单或榜单而已，可以作为阅读时的参考也可视而不见。”一位出版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本文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刘悠翔）

金宇澄·《繁花》·饭局·口水上海

“上海人金宇澄当过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20年来，他没写小说，一直在杂志社安静地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在自己快退休的时候，在网上用上海话写故事出了名。”

“故事都是真的，很多是他在饭局上听来的，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故事们变成单行本《繁花》出版，金宇澄如今是当下文学圈里最火的作家。”

老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那个年代的老上海，本身就像一部黑白电影。金宇澄越来越发现，身边的人和事都跑得飞快：当年给他讲民间故事的保安过世了，当年的老上海也快改造完了。

《繁花》网名《独上阁楼，最好在夜里》，源自金宇澄有一搭没一搭的网络帖。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包括他们的情欲、梦想和迷茫，都是他听来的故事。

用金宇澄的话说，用的是“苏州说书的方式”：“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

义’的内涵；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原本33万字的《上海阿宝》删掉2万字，变成《繁花》问世。几十年不发评论的《收获》破了规矩，邀请评论家程德培、西飏撰写了2万字的长篇评论，和小说一起发表。杂志脱销，只能加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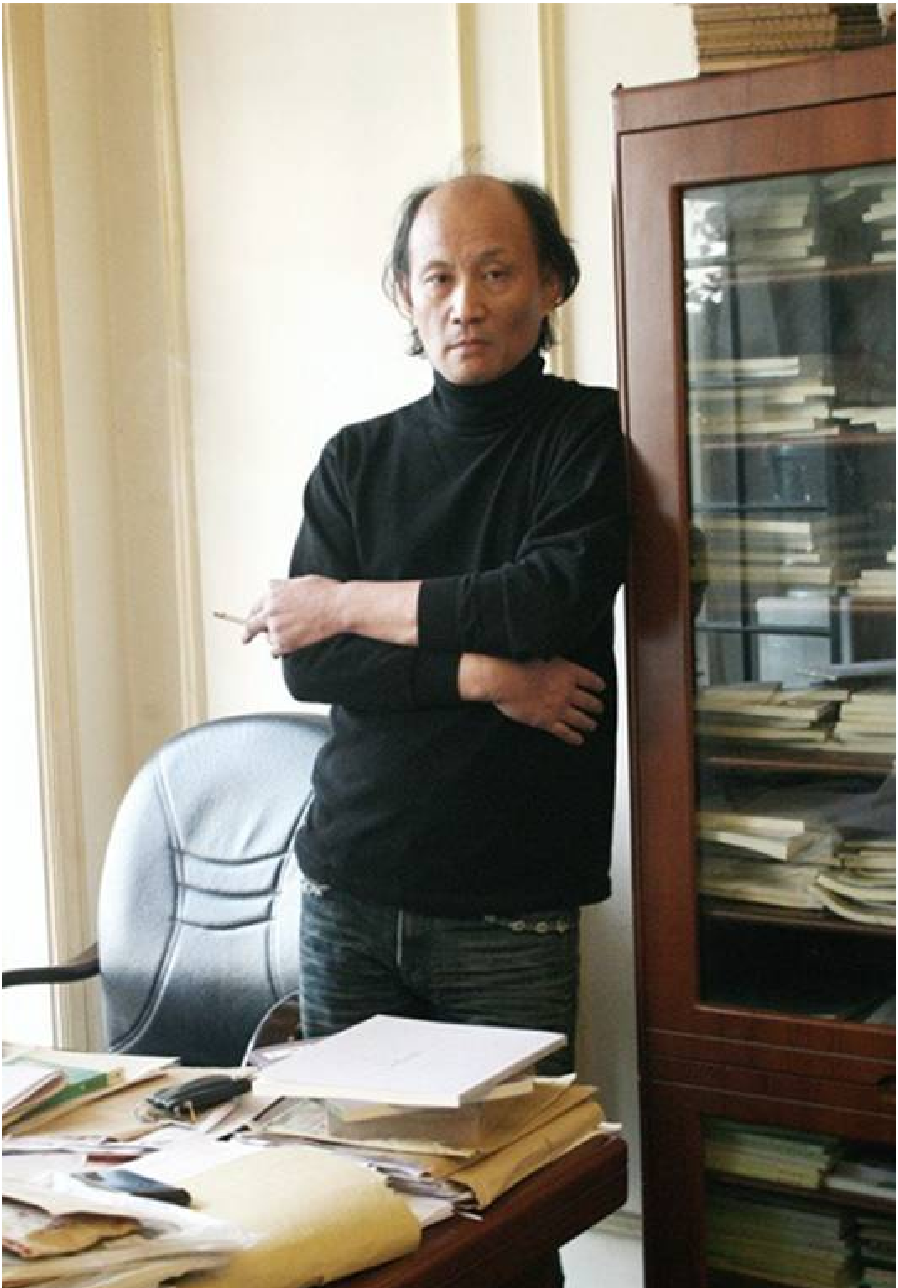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吴语方言进入小说，过去一些上海作家进行过试验，效果都不如金宇澄。

“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对《繁花》做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2013年2月26日，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牵头的《繁花》研讨会上，李敬泽、吴亮、程德培、郜元宝、汪政等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大多把《繁花》、金宇澄和张爱玲、《红楼梦》相提并论。

在《收获》发表的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了4次，加了20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单行本《繁花》出版，拿下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小说榜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提名等荣誉。

金宇澄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等于侬吃一只茶叶蛋荷包蛋，蛋是啥地方生，啥地方鸡？毫无意义。朋友说，这可以无所谓，不对的。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一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是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金宇澄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作家："一天躺在鸦片

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陆杰/图）

“西式面包很多，我就煮碗面条吧”

记者：没有网络，就不会有《繁花》。网络写作给你的新奇感和刺激在哪里？

金宇澄：在网上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些跟我帖的人是谁，写作者和读者非常近，让我的写作热情逐渐升温，这是非常新奇的事情。

过去我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那些作家，他们一天躺在鸦片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写完《繁花》，我觉得这种连载方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到。

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我上来发帖就是闲扯，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和很多上海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女人的话，我实际上跟她分别有七八年的时间，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和一个离开她七八年的你，对这个城市的想法，对这段生活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记者：相比《收获》发表的版本，单行本里增加了哪些东西？

金宇澄：说到工人阶级这块，我加了抄家的详细场景，比方说保险箱打开里边什么东西。过去的工人是什么样？我所知道的工人情况加了很多，包括他们成千上万参加青帮，工厂里边全是帮派，帮派内部又分广东帮、浙江帮、绍兴帮、苏北帮、湖北帮。当时就连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去搞运动，也要先参加青帮。

上海解放的时候，上海总工会向全国总工会做了一些汇报，比如上海工人阶级的情况：某某厂多少工人有小老婆，多少工人有性病，多少工人穿西装，食堂里边怎么浪费粮食，还有人喝啤酒……农民对工人不满意：工人的疗养院，地毯比他的被子都好。

包括“文革”时候，工人师傅抄家，为什么掘地三尺找金条？这其实是农民思维，他们在土地上挖了几千年，挖土豆、红薯，房子里边也要挖。后来还办抄家日用品展览，主要增加这些有趣的细节场景。我觉得等于像画画一样，你可以把它画得更细一点。

记者：《繁花》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好像小说不应该有政治主张，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要去强调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人生好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张树叶，一朵花，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小说的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我20年没写小说，反过来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题材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有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前受苏俄文学影响，改革开放后受欧美和拉美文学影响，从小说的文体、结构到叙述语言、句式，穿的都是别人的衣服。许多小说，长得都是同样面貌。既然西式面包很多，那我给大伙做一碗面条。我给读者煮的“面条”，是传统话本，可以用橄榄油。

物质匮乏年代的梦幻邮票。金宇澄把写书比作画画，总可以画得再细一点。这使他的书里写满了人生琐碎。琐碎里，是时移世易中，人们不变的生命力：在合适的位置上讲话、做事、交朋友，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金宇澄/图）

饭局上听来的故事

记者：你说很多故事是从饭局上听来的，你平时的饭局多吗？

金宇澄：老外讲起来，中国人见面就是吃饭。吃饭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更加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比如小毛这种朋友圈子。我插过队，在工厂当过工人，这样

的老朋友不少。

有一次饭局，一个人说她们家小保姆回家过年的时候，老家人叫她带十双皮鞋，这种皮鞋20块钱一双，一大堆才一百多块钱，她说累死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种乡情，即使觉得重，也要带回家。

很多饭局上，每个人讲一点奇闻异事，讲讲饭吃完了，也结束了。如果你随身带着录音机，一年饭局筛选下来，肯定能够录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繁花》里经常写没有任何意义的吃饭，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更加有意义？我已经60岁了，这么多年，有多少饭局，会遇到多少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会特别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故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记者：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

金宇澄：有一个饭局，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干嘛的，饭桌上有几个弄堂里边的人。有人问女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我当时一惊，问她阿姨做啥，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

有人事后说，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之后就吵架，如果找一个高级干部，找一个优质的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气质也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我觉得奇怪，在市民阶层里边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谈的。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巴尔扎克写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淡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我就在小说里讲一些大家疏忽的边角材料，我对这个感兴趣。

记者：但什么故事你会用到小说里？

金宇澄：《繁花》里陶陶和小芳很恩爱，他们同居了。后来小芳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小芳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嘛……他们两个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我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他离婚后跟这个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一个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她家里来。男人回家里总觉得情况不对，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

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男人大哭一场后，给服务员买了化妆品、文胸和里外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化好妆后，他准备躺在她边上触电自杀。没想到电线短路跳闸，整个楼断电，他就跑到屋外去看，门没关好，结果灯突然亮了，楼道里的邻居发现不对头。因为他不会化妆，给服务员抹的口红一塌糊涂，看上去特别吓人。于是案发，他承认自己掐死了她。

法院取证，打开女服务员日记，日记里结婚三年，一个字没提男人，老是在说：我缺钱，我这个月要挣多少钱；下个月记账，我太需要钱了，太需要钱了。因为这个日记本，法官觉得这个男的太可怜了，最后法院判他15年徒刑，本来这种案子肯定判死刑。这个故事看一眼就记住了。

另外一个故事：一个中年妇女跟丈夫过得没意思，儿子读高一，她在外面跳舞和舞厅音响师有了婚外情。未婚的音响师每晚送她到弄堂门口，看她进门才离开。后来弄堂里一个小孩把此事告诉了她儿子，高中生跟踪母亲去了舞厅，次日拿了一把长刀，跑到舞厅把音响师捅死，然后跑掉了。

音响师当时还没死，他一看知道是女人的儿子，为了保护女的，对警察说凶手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安徽人。后来公安局调查出真相，儿子被抓，女人号啕大哭，老公也跟她离了婚。

这些令人震撼的故事，作家是想象不出来的，才能够收到小说里。

言情小说给你希望 文学给你真相

记者：1990年代部分写了很多年轻人，你怎么了解他们的生活？

金宇澄：因为工作，我会认识不一样的人。我碰到一个女中学老师，学生跟她讲，爸爸妈妈是吃“城市低保”的，成天就在外头那种最差的地方打牌跳舞。学生说，我读什么书啊，我将来也可以吃“低保”。女老师急坏了，跑到学生家里去，一看傻眼了，爸妈跟孩子在一起看黄色录像。这种场景你能想象出来吗？

还有个朋友讲的故事。一个女职员认识了一个在加拿大留学的男生，两个人有感情，男孩子就不回加拿大，变成男女朋友。在上海同居一年多，男

孩子爸妈根本不知道，还以为儿子在加国留学，平时就是发e-mail联系。

这就是时代带来的变化，在1960年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记者：时移世易，你的小说中对1960年代市民生活的描摹勾动了很多人对旧事物的缅怀。

金宇澄：老舍先生说过，写一个人，你要有一千个人做准备，得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什么都要准备好。《红楼梦》前8回，荣府的菜单，一大家人分别穿什么衣服，戴的什么饰物，淋漓尽致，写得特别漂亮。

我觉得这才是小说关心的事情。那些生活的风貌、场景已经过去了，那些细节逐渐被遗忘，我写这个小说，应该把它补上，把当时生活的场景还原出来，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消失的时代。

小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实际上还是需要很多传统功夫，比如他是一个什么时代的人，就要讲什么话。他是一个海员，你一定要让他讲海员的话，或者说写一些航海故事和一些机器方面的知识。

这一点上，西方小说家做得更好。格拉斯有一个小说《猫与鼠》，他写几个孩子在一个二战废弃的兵舰上面玩，这个兵舰上面所有的炮、螺丝钉，都有具体的名称。

记者：物质与生活内容的新旧更迭当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吗？

金宇澄：生活中不变的东西就是生命吧，市民阶层中的一种生命力。每个时代的生命力都不一样，但这个生命力都非常顽强，它能够适应不断的变化。

打比方说上面规定下来我们要五讲四美，要怎么样，底下人就会非常灵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准则。有些人调整不好，就完蛋了。

这个支撑点我觉得是生命力，或者说是人的欲望。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面讲话、做事情、交朋友，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人都是一样，我父亲告诉我，人一到70岁就准备吃苦。他的意思就是人生从此没有乐趣了，你胃口不好了，也不想吃东西，也不想买东西，也不想干嘛，什么也不想，而且要忍受病痛的折磨。

刚出生的小孩子眼睛明亮，年纪大了眼睛就非常浑浊。人必定衰老，必定死亡，从荣到衰，《红楼梦》最后就是这样。人像一朵花，花开花落，你无法抗拒，但大部分的人不喜欢悲剧。就像鲁迅先生所讲，一个孩子出生，有人说他将来要死的，结果被人家打一顿；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做官

发财，大家就喜欢。但我觉得文学，应该和言情小说不大一样，言情小说给你留一点希望，文学应该是直面人生，告诉你真相。

记者：当下和过往之间，你更享受哪一边？

金宇澄：每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肯定是怀念过往的。人生最早的那个时期，实际你已经想不清楚了，那时光像一个舞台，中间隔着几层，有薄纱有大幕，朦朦胧胧，有诗意，散发着光彩。你越靠近，越发看不清楚。艺术有这个魔力，把这朵花开的时候延长时间，用一个慢镜头，留住它绽放的时光，让它仔仔细细地开在你面前。

记者：小说结尾为什么用黄安的歌词《新鸳鸯蝴蝶梦》？

金宇澄：阿宝讲，这个社会还有什么新内容呢？小毛要死的时候，他要抓住什么呢？什么也抓不住，惟一能够带走的，就是一些温柔同眠的事情。你的房子，你的钱，你的汽车，能带走吗？我经历了一些同伴们的死亡，包括那些很有钱的人，死的时候告诉我，惟一能带走的就是我过去和某某人的记忆。还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感情，是能够触碰到他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他说，我惟一能够把这个带走。

金宇澄手绘记忆中1964年的老上海：刷牙两分一次，热水盆上都写着“囍”。他铭记老舍说的：写一个人，就要有一千个人做准备，得上知绸

缎，下知葱蒜。（金宇澄/图）

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

记者：“沪生”这个名字乍看感觉是土生土长，多想一步，恐怕是外来的人在上海生了孩子才会起的名字。

金宇澄：我为什么要用沪生？因为北京一个电视剧《渴望》，里面有个上海人王沪生，是被丑化的上海人。真正上海生活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子？北京人并不想了解，也不想知道。《繁花》里的沪生肯定和外人描写的上海人不一样，因为我懂上海人。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记者：小毛、阿宝、沪生、蓓蒂，这些名字自然而然带出了他们的“出身”：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子弟、知识分子……命名来自记忆，还是有意经营？

金宇澄：当然是有意经营的。取名主要是为了稍微的符合一下他们的身份。我的一个弟兄，过去工人阶级的子弟，弄堂里边他的小名叫“猫狗”，就等于像北方叫拴柱。猫狗就是好养活。当时普通老百姓给小朋友取的外号，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外号是有区别的。

我要增加一些真实感，肯定名字也重新做过，所以和网上（版本）的名字很不一样。而且小说里有很多女人，也不能有重复，比如有芳的，最好别的女人就不要叫芳，因为怕混在一起了。

记者：阿宝、沪生、小毛的原型都是谁？

金宇澄：小毛的原型是我插队的时候，在火车上认识的，当时他就坐在我对面，我和他一起下乡。他家里就住在类似于“大自鸣钟”这块地方，插队后回到上海，就是看门、在食堂里做。我一直跟他有来往。这个人的死和小说里一样，一辈子没有结婚，死的时候，不到60岁，我们去看他，周围都是女人。

阿宝和沪生，都是由几个人捏起来的。阿宝死的情形是真实的，他妈妈问他要股票账户和密码，他当时非常悲痛，他一直以为自己不会死。他妈是没办法，他家里的房子是租赁房，要办理过户给侄子，不然他一死，国家就收掉了。问完以后，他妈妈就跑到外面抱着电线杆大哭。

记者：在《繁花》里，手绘地图和建筑示意图为什么那么重要？

金宇澄：地图是真实世界的坐标，也是故事场景的发生地，主人公们在此

地出没。我写的时候，就会觉得地图会帮助读者，从视觉上增加一点情趣，帮助读者进入那个时代。

我在《上海文学》的时候，开过一个叫《城市地图》的专栏，要求每个作者就写他熟悉的街区，每个人都画一个地图。后来我发现，他们稿子都写得挺好，但画不来地图。《繁花》的单行本里，我画了20幅，16幅插图加上4幅地图，就是希望有点情趣吧。

记者：你不同意“城市无文化”的论调，为什么？

金宇澄：这是中国特色的结论吧。中国文学喜欢为城乡分类，写到城市，必然是资本主义，是阴暗、罪恶的。农村则是阳光、明亮、诗意、美好的。以往作家一写农民题材，家门口一条路，一侧是个猪圈，一侧一块菜地，房前屋后几棵大树，但不管如何歌颂赞美，还是单调。

我觉得城市里边更丰富，街上有各种各样店铺，不一样是风景吗？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有好的故事。西方小说的大部分，都是书写城市的。乡土并不高出城市一等，乡土情感的发现、表达，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写得好和不好之分。

记者：上海是最常受外人批评的城市，是否因为上海在文学中的建构远未完成？

金宇澄：上海是中国城市发展最丰富的地方，是都市的样板，上海的生活方式、市民状态，在中国很具代表性。人是城市的精神象征，要写好城市，应该深入小弄堂，看看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有8年时间在东北，我可能看上海比一直未离开上海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我有时候上网看，对上海的历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很多人说全国人民养了上海多少年，所以我在小说里就做一些实事求是的交待，包括1949年以后，从电影厂，出版社，大学老师，翻译官，大量的机构和人才搬到北京。上海淮海路有一个非常高级的公寓，里边所有的暖气设备一解放就拆到北京去了。后来的几十年，因为备战，上海大量的工厂迁到北京、安徽等地，这些都是上海真实的经历。

所有城市知识分子相互之间沟通没问题。但这些知识分子用知识分子眼光来批判上海市民，就产生问题了。如果用市民的眼光对照市民，这样可能更加准确。

（本文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老爷叔金宇澄其人

“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

金宇澄全家福。父亲出生在富商家庭，后来参加革命，上海解放后成为公务员。和大部分中国人一样，好日子没过多久。

“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

如果不是偶尔上了“弄堂网”，金宇澄不会再写小说。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过去的味道，梁朝伟《阿飞正传》结尾的样子，电灯下面数钞票，数好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清爽放入口袋，再摸出一副扑克牌细看，再摸出一副来……然后是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细细梳好，全身笔挺，透出骨头里的懒散。最后。关灯。这个片段是最上海的，最阁楼。”

2011年5月10日中午12点，金宇澄在刚注册的上海弄堂网文字域论坛里，化名“独上阁楼”发了帖子。弄堂网是上海作家陈村的朋友“老皮皮”创办的，一个怀念老上海生活的网站。

他只是随意发帖，用上海话写些自己亲历目睹的人和事，偶尔还对上海的旧城改造提些意见。每个帖子都得到了网友的积极回应，叫他“爷叔”、“老克腊”，催他接着讲古。

以前一直闷头写作的金宇澄有了从未有过的新奇感和刺激感。“我每天早上起床后，随手写一段就发帖，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作者也不知道读者是谁，怎么好看有趣怎么写，这样的互动却很有意思。”

三天后，金宇澄写到1980年代上海露天菜场，一个卖螃蟹的风流老板陶陶的故事。突然有了写作快感：“写得欲罢不能，实在是奇怪跟烦恼，希望快点结束。”这段故事，最后也是小说人物陶陶的原型，是一位与金宇澄一起下乡的老知青，据说因为吸毒，到处借钱，最后生死不明。

网上写到一万字，金宇澄突然意识到“这已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才警惕起来，做小说结构，从纯粹的上海方言，逐渐转为全国读者看得懂的“上海官话”。

阿宝、腻先生、梅瑞，人物一个接一个地现身，每日更新的文字越来越长，一开始每天写两三百字，到后来，一天写了5000字。有时候去外地开会，几天没写，读者急了，不停地催促：“老爷叔，不要吊我胃口好吧。”

接连写了5个月，保存下来的文字，竟有33万，暂名《上海阿宝》。

金宇澄把一些章节发给作家朋友看，朋友们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这让他慢慢有了野心和追求：“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上海经常被处理成很表面的状态，比如外滩、旗袍、百乐门，我写这个小说，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希望能消除人们对上海浅表的看法，也能够回击‘城市无文学’的论调。”

从卢湾里弄到嫩江农场

成为作家前，金宇澄曾是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

1952年12月8日，金宇澄生于上海。父亲是苏州吴江人，出生在富商家庭。高中毕业后跑到上海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成为潘汉年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

作为新中国建设的有功之臣，上海解放后，父亲成为公务员，“吃政府饭”。和所有的干部家庭一样，他们搬进上海的核心城区卢湾的新式里弄里居住。金宇澄是家里第二个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1954年3月，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被隔离审查（所谓“潘杨案”）。金宇澄父亲等昔日老部下也受影响，停止工作，接受政治审查。

“我父亲一进去，上级就通知我们搬家。当时是供给制，干部可以不带任何家具搬进去住，一旦出事了就要你搬出来。我母亲当时带着三个孩子只能搬离。”还在童年，金宇澄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

父亲关了两年出来，同母亲离开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劳动。“我们三个孩子在上海，日子过得艰难。”

那时候的上海，像一部黑白电影。

“河滨大楼天天有人跳楼、自绝于人民。”“长乐路瑞金路的天主教堂忽然被铲平了。”“弄堂里，天天斗四类分子、斗甬师太、斗逃亡地主。”“大妹妹的娘，旧社会做过一年半‘拿摩温’（注：旧上海英国纱厂车间里的工头，一般编号都是第一：NO.1，被译为拿摩温。），运动一来，听到锣鼓家什呛呛呛一响，就钻到床底下。”“隔壁烟纸店小业主，一自首，打得半死。”《繁花》里这些远去的记忆，都是作者的耳闻目睹。

1969年7月，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了黑龙江嫩江农场4分场插队，一待八年，1977年才返回上海。一到农场，每个知识青年都要“过堂”：你父母干嘛的，什么政治身份？有些分场是青年住房被高墙铁丝网围起，四个角都有岗楼，“后来知道，嫩江农场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大型劳改农场。”

这八年，金宇澄种过玉米、大豆，农闲的时候，做过泥瓦匠，盖房、砌石头墙、砌火炕、出窑、掏井、补缸，磨过豆腐做过粉条，给农场养过马。

为了回上海，知青们各显神通，想尽了各种办法。很多人想把自己弄出毛病来，肝炎、残疾，都可以办病退回上海。金宇澄得过胃溃疡，不愿意下地劳动的弟兄们，都找他冒名顶替去医院看病。一个月里，他拍过七八张X光钡餐片。一个医生认出了他，把他拽到一边，拍拍自己身上的铅围裙，“你帮别人拍片子不对，一个月吃了多少射线，会对身体的健康有影响。”

1974年，金宇澄从农场回上海探亲，见到一个神奇的汽校中专毕业的大姐。大姐家住老上海北站宝山路，记忆力超常，能够口述全本《简·爱》、

《傲慢与偏见》、《悲惨世界》、《九三年》。这些小说都是禁书，只有极少人能看到。每周三的下午，她坐在石榴树下打着毛衣，给身边围着的一群文艺青年讲小说，大家听两三小时，约好时间下次再来听。

几年里，金宇澄惟一的娱乐，就是给朋友写信。“现在想一想，后来成为作家，还是靠当时几年写信打下的基础。当我回到上海以后，才觉得自己可以搞文学了，经常心里想我要写点什么。”

离开黑龙江多年，对各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念活动的邀请，金宇澄从来都是拒绝。他再也没回过嫩江农场。

“你们知识分子才问 这样的问题”

金宇澄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文革”结束后，金宇澄父亲被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政策，落实了住房。“我们家的劫难终于结束。”金宇澄当时在一家钟表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工作。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上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失去的河流》。他已经33岁了。次年他的《方岛》在《萌芽》发表。《失去的河流》和《方岛》接连获得两届《萌芽》小说奖，在工厂上班的金宇澄因此获得机会，进入上海作协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学习。他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一批基层的文学作者，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1986年，《上海文学》以青创班专辑的形式，发表了金宇澄的《风中鸟》、孙甘露的《访问梦境》、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1988年，《风中鸟》得了《上海文学》小说奖。也是在这一年，金宇澄离开工厂，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的编辑。

1990年前后，金宇澄在《收获》发表过几篇中短篇小说后，专心编辑业务，停止小说创作，偶尔写写散文随笔。他说当编辑每天挑剔别人的作品，很难鼓励自己再写小说了。

不写小说的日子过得清闲适意。每周去单位上三天班，看稿子，给作者打电话，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不上班的日子，也赶赶儿时玩伴、插队和工厂时期的朋友发起的饭局。流动的饭局上不断出现的新面孔，是城市人日常生活重要的场景。一顿酒吃下来，不仅见到三教九流的江湖朋友，还由此得知许多人生故事和传奇。

《繁花》里小毛给沪生讲过一个故事，其实是金宇澄一个老朋友的经历。

一个深夜，小毛下班在汽车站等通宵车，遇到一个女人。小毛搭讪问她去哪里，女人不说话，最后说三个字：洗衣服。小毛说，我是单身，你到我家去洗，我家有洗衣机。女人不理他，当通宵车来的时候，和小毛一起上车，最后跟着小毛后面下车，一直跟着他进了家门。

进屋以后，女人一直不吭声，但很自然，像回家一样，是夏天，把衣服脱了，文胸短裤，帮小毛倒洗澡水，给他擦身体，自己再放水洗澡，最后上床躺在小毛身边，两人开始做爱。等小毛醒来，听到她在厨房洗衣服，也不用洗衣机，早晨四点多钟，女人叫醒他说“我走了”。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门锁的声音，后来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当时我很好奇女人的原委。朋友回答说，这是你们知识分子才问的问题，我是从来不问的。她对老弄堂房子结构那么熟，说明她也住这种房子，为什么？这跟我没关系。”金宇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老朋友是个保安，一直未婚，前几年病逝了。在弥留之际，金宇澄去看他，病房内围了一堆落泪的女人，老中青都有。

“我和他都是16岁时去黑龙江务农的，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回沪后他在厂里看门，我做文学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交往还是很多，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去世了，这一扇讲民间故事的大门就关掉了。我心里很难过。”当年的玩伴，这一代人，阿哥阿姐，也开始陆续离开人世。

离去的还有老上海。随着街区改造，一些店铺离去，一部分人离去，老上海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也消失了。“靠南京西路的吴江小吃街，摆摊便当，城管来捉，无数大小里弄可匿可笑，闹猛，也家常，各抱地势，各不相干，可以响一响粗喉咙，发一发妹妹嗲，五花八门。”

“静安寺背后愚园路一带也改造掉了——久光商场背后，建造了一个公交汽车立体车库，没有人会到集中废气的环境里荡马路了。”

按照新规划，吴江路、大中里旧城区，已经一概拆除。据说是拓宽拉直。“大马路，你再大再宽，照样塞车，法国人一百年前就晓得的道理，路越宽越堵……这里曾经很热闹，转角百货店，新华书店，几条大弄堂，改造完毕一定辽阔敞亮，也是由特殊，成为一般，没了个性与历史了。”

这几十年里，金宇澄熟悉的街道、弄堂不断地消失，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上海的精神的代表是小马路，曲曲弯弯的情致，有遮有盖，有骨有肉，回眸之媚，绿肥红瘦。如今上海的设计，还有衡山饭店门前的6路相

交，美丽辐射的设计吗？没有了。好比一个女人，没有了曲线，一眼看到底，一点蕾丝花边也没得，就穿一身透视装，没啥味道了。”

上海越来越像一个二三线的新城市。“我甚至怀疑，这些城市设计者与规划者的背景，——城市保留的是建筑，最后就是人，他们不懂城市的感情，一个没有感情的设计者，能做什么呢。”

金宇澄的居住地，从卢湾区搬到普陀区，又搬回了他生长的卢湾，但如今，卢湾区已经消失，和黄浦区合并了。

已经60岁的金宇澄，在人生记忆最丰富的年龄，回忆他的情感，记录他和朋友们的人生，还有他生活过的城市，把这些时光和记忆，忠实地记录在了《繁花》里。

（本文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张英）

金宇澄 好作家要独特

初秋的午后两点，天气依然闷热。静安区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的院子里，是一栋宁静安逸的老洋房。沿着陈旧的木质楼梯，能一路走到金宇澄的办公室。推开门，宽敞明亮。

这幢洋房原是旧上海实业家刘吉生的宅第，由著名建筑师邬达克1926年设计建造，耗计20万银元，以高至两层门廊、爱奥尼克石柱、蝴蝶喷泉、普绪赫女神雕像而闻名，被公认为上海最美的花园住宅。1950年代，改由上海作家协会使用至今。“文革”时期，这里一片狼藉，所幸女神雕像被一花匠埋入泥土得以保存。如今，雕像仍然立于庭院中央，成为“爱神花园”的灵魂所在。

历史的沧桑，化为几代作家的摇篮。作为上海文学事业的中枢，《收获》、《上海文学》、《萌芽》以及《上海文化》编辑部都设在这里，夏衍、巴金、丰子恺等文坛大师也在这里留下足迹。1988年，金宇澄任《上海文学》编辑，他的“书房”与《收获》同在三楼。在这里，金宇澄看了26年的小说稿件。“编辑最不一样的地方，读稿比看书多。”金宇澄说。

看稿、阅读、写作，金宇澄的办公室早已被他视作书房。在这里，目光所及之处都被各类书籍占据。有在书架上排列整齐的，也有杂乱堆放成摞的，还有的书被他收在了办公桌旁靠墙的两个大书柜，以及后面房间的橱子里。

其中一个书橱放着许多作者的来稿。“我没有藏书意识，每次搬家都会送掉好多书”，金宇澄说，专业研究者或许需要坐拥书城，对于小说家来说，藏书量并不特别重要。书大多是自己买，也有朋友送的。“现在逛书店的时间比较少，网上看到不错的书，就叫单位的小朋友帮我买。”

金宇澄强调，对于小说家而言，哪里都可以是书房。“有的人比如我，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家和单位也就是最主要的书房，甚至我在这里（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搬过几次家之后，金宇澄选择开放式格局，家中的客厅和书房都混在了一起，“和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不太一样”，家里任何地方都有书，“写东西用手提电脑，经常在沙发上看书，写文章。到处有书，厕所里也有书。所以书房究竟是个什么概念，我不知道。”

“地下”阅读史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多是在青少年，甚至童年时代就被刻下某种烙印

的。

1960年的少年时代到1970年的青年时代，是金宇澄在书籍中成长的十年。记忆中，他曾经的阅读圣地，是一座位于上海复兴中路的少年儿童图书馆。读了什么书早已记不清楚，脑海中浮现的是一路通往图书馆的风景——甬道悠长，两边的金色梧桐摇曳，对面的法式公寓终日传出悠扬的琴音。

没读完初一，“风景”突然被“文革”画面切换。金宇澄父亲是打倒对象，全家搬到了沪郊。有次他听同学议论，少儿图书馆的大门被钉死了。图书馆一直是部分学生组织的注意目标，金宇澄大哥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也紧盯着校图书馆。有一天，校外某个学生组织突然行动——在驻校多个学生组织的眼皮底下，所有“有批判价值”、“反动”图书，被迅速搬走。

金宇澄眼中属于书里书外的各类“风景”戛然而止，他的“地下”阅读史也在此时拉开帷幕。除家中一套1940年代出版的《鲁迅全集》之外，金宇澄最早接触的大部分是苏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是很少见的版本，托尔斯泰早期的战地特写集。还有《顿河故事》(草婴译，50年代上海文艺版)，是大名鼎鼎肖洛霍夫早期的习作，强调人性张力，父子、兄弟相残，赤裸而惨烈……”金宇澄回忆道，“我这一代的阅读，基本是乱翻乱看，是无系统的即时行为。某种既鄙视图书、也对书籍极其珍视的大背景，形成了我这代人所谓的‘地下’阅读史。”

上海记忆

而今的金宇澄，被很多人与上海的城市记忆联系在一起，《繁花》也成为海派文化符号之一。有人称他为“老克勒”，但是他不喜欢这个称呼。旧上海所谓的“老克勒”，也许是最早吸收西方文化的那一群上海人？经历殖民地时期的上海摩登年代，衣着摩登、讲究生活的品位格调？“我不是这样的人”，金宇澄说。

不愿成为“老克勒”中的一员，那究竟何谓上海人呢？金宇澄觉得，只要在上海，就是上海人。“上海人，很少有所谓那曾经‘小渔村’的子孙，上海人来自四面八方，等于费里尼说的罗马——上海同样是一个‘遭人诟病’的城市，是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母亲，她随便他们来，随便他们走，母亲一直是不管的，母亲管不过来——改革开放后的上海，是经历了1840年开埠后最大的人口迁徙潮吧，应该来了两千万人。”金宇澄说。因此，《繁花》是用“改良沪语”写的一部小说。“为什么要把语言改到大家都能懂？我并不想强调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高下对比，仅仅是把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描述出来。上海味道，并不拒人千里之外。”

在上海这个独特的城市里，多少悲欢离合一直在上演，《繁花》密密麻麻写满了市民生活的琐碎。有个饭局，金宇澄遇到一个女孩子，当别人问她何时结婚时，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金宇澄问她阿姨在做什么？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金宇澄记住了这个故事，“其实‘包’这个字，《金瓶梅》里已经出现，只是环境和对象变更了。饭桌上后来有人说，这种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肯定会吵架，如果找一个大领导，优质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硕博连读’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饭局，经常是金宇澄听取故事的地方。“饭局是中国人的特色，城市人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必须要表现的内容”，金宇澄说。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聊天，更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繁花》里的主人公小毛，正是这个底层圈子里抽出来的形象。而表现小毛这类群落的饭局，是为了换一种讲故事的方法。“如果大家集中写知识分子苦闷的生活，那我就写没有知识分子的生活，写小市民的、一点都不装的、非常俗世的生活。”

此刻金宇澄突然发问，“你和你的小学同学有来往吗？也许大学同学还有几位谈得来的，但小学同学肯定没有”，他旋即说，“如果你碰到小学同学，才能发现社会的另外一面。说不定有人生了三个小孩，有人在摆摊，他们的世界观你了解吗？”

文学不是风花雪月

写了《繁花》之后，金宇澄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这部无心插柳的小说拿了很多奖项，影视版权已经被王家卫购买，想要采访他的媒体和意想不到的盛誉一起蜂拥而至……

近来让金宇澄屡次见诸报端的，是香港书展上和王家卫的对谈。回忆书展对谈那天，金宇澄和王家卫刚到会场，就看到一大堆记者拿着照相机从走廊很远的一端冲了过来，“我开始跑掉了，躲在边上。后来王家卫把我拉出来一起站着拍照。”

在被王家卫看中之前，《繁花》已在主流文学界赢得广泛赞誉，屡屡斩获大奖。给作家们做了半辈子编辑的金宇澄，看多了作家和作品，评价好作家的标准很是明确——独特。“文字、语言样式，开卷就能感受个人风格，独特、排他的冲击，以特有姿态亮相，这是难忘的文本面孔。”金宇澄说，“我一直以这个标准看待小说家，也同样这么要求自己。如今的小说来稿，相对缺少个性、文艺腔、翻译腔的现象很普遍，不少稿件看着就像一个人写的，千人一面。我个人认为，对讲究个性的文学来讲，这就代

表了失败。”

在金宇澄眼中，好作家的语言和内涵，都有明显的识别码，重在个人魅力。他曾经打比方，写小说等于开肥皂厂，是在生产一个产品。“你要了解你生产的东西，外面是不是也有很多？比如外面红颜色的肥皂特别多，你就要做一个绿的。写文章也是，大家都这么写，那肯定有另一些东西没人写。”

金宇澄对文体有浓厚的兴趣，《繁花》用了很多早已不用的“鸳鸯蝴蝶派”词汇比如“低鬟一笑”，包括人物讲北方话，就会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包括最简单的标点，不用问号，包括夹有繁体字，书中提到旧书或旧句子，就出现繁体字。“我喜欢这样的特点，感兴趣这样做。去年这书出了台湾版，这些字就看不出来了——人家全都是繁体字。”

他眼中的文学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生活在暗处何底层的，被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你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金宇澄补充说。

金宇澄近期书单

- 《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 著）
- 《中国人的特性》（【美】明恩溥 著）
- 《鲜花帝国：鲜花育种、栽培与售卖的秘密》

（【美】艾米·斯图尔特 著）

- 《盲眼钟表匠》（【英】理查德·道金斯 著】
- 《汉字百话》（【日】白川静 著）
- 《国文趣味》（姜建邦 著）
-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 著）
- 《纸牌屋》
- 新版全版《教父》

以良友为伍，了解世界

记者：最近对哪个类别的书比较钟爱？

金宇澄：我至今是《上海文学》的小说编辑，占据最多阅读时间的是小说稿件。我没有阅读计划，一直是翻闲书的状态，阅读也一直很杂。最近常看的是《希腊人，历史文化与社会》、《花经》、《植物的欲望》、《瓦德西拳乱笔记》、《雪域求法记》、《东正教在华百年史》、《高朗桥纪事》及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以前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说说你欣赏的国内外作品。你认为中国的作家最缺乏的是什么？

金宇澄：《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安徒生童话》，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中国作家最缺乏的，应该是创造力，当然我们一直喜欢山寨、模仿。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最有特点的，除了过去说的火药，估计只是一双筷子。

记者：会特别留意那些方言写作的作者吗？像老舍、李劼人。

金宇澄：前些年很注意湖南作家何顿的方言小说。你提到的这两位，属于北方语系，这类方言如今有更活跃表现。吴语写作已经是很多年的式微了，物是景非。现在的语言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几代人都是经过普通话教育，学习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对经济建设多方面来讲功不可没，但文学必以活泼的各地方言为支撑。过去说方言就是"活文字"，如今非北方语系的作者们，早已习惯用普通话讲、写、听了，根本忘记了本土语言的写作。即使如《繁花》，虽然用了沪语言思维，也不会再有当年吴语言作者那种无所顾忌的自由了，受众环境已改变，需要小心翼翼改换、改良，才能获得更多的读者。

记者：有藏书习惯吗？

金宇澄：没这习惯，书架一直很乱，每次搬家都处理掉一些。本雅明讲过，"收藏家的态度，最高意义是继承人的态度"。人生很短，我习惯处理不用的书，给需要的朋友。

记者：反复看的书是什么？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

金宇澄：最近看的几本，《太平天国史料》、《忧郁的热带》、《谈艺录》、李伯元《南亭笔记》、《歇浦潮》、《秧歌》、包天笑《钏影楼日记录》。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全集》。

记者：出差或是旅行会带怎样的书？要是有一天流落荒岛，必须带在身上

的书是？

金宇澄：出差或旅行，会带轻便的小册子，像《读书》、《万象》，可惜后一种停刊了。去荒岛，应该是《圣经》。

记者：对你而言，阅读最大的乐趣何在？

金宇澄：以良友为伍，了解世界。

2020年，请看王家卫的《繁花》

王家卫将执导《繁花》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毛遂自荐，希望担纲改编剧本，但王家卫独独钟情于金宇澄：剧本还是要你来把关。金宇澄答应与王家卫共同合作梗概，但不改编剧本。

《繁花》的话剧剧本改编，也在紧锣密鼓地创作中，预计2015年秋天首演。电影《繁花》的进展会如何呢？王家卫对电影改编充满信心，认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计划用五至六年完成《繁花》拍摄，按照王家卫的时间表，电影将在2020年杀青。同时套拍的还有电视剧版。

“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热情就可以做成。《一代宗师》这个想法在1990年代就有，但是要做成这样一个电影必须等待时机，人对、时间对，还要有条件。”王家卫说。

“《繁花》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2014年7月18日，香港书展，“金宇澄、王家卫：《繁花》写出上海故事”对谈活动中，王家卫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金宇澄的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些书看完之后，马上盖起来，看一次就够了。这种书你看完之后感觉经过了一生一世，我看《繁花》是一口气看的，看完之后再没打开过。金老师把他一辈子的故事、他要讲的话都放进去，就是很浓的一锅汤。《繁花》可以写十本书或者二十本书，真是有点亏了。”

“这种性感不是粗犷，也不是颓废”

王家卫的拍摄思维，需要大量旧时代照片参考，大量的人物肖像照，电影《繁花》中的演员造型，或许将从这些照片中产生：“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金老师心里面有数的，所以我希望他在那个时代的照片里面找到所有人物的原型，从这个起点再去想演员。”

金宇澄提供了包括上海摄影家陆元敏拍摄的“老洋房里的上海人”等主题的照片，王家卫看了觉得很好。

“可以从一张照片开始说《繁花》的故事。”王家卫最初设想了三张集体照，人们围着桌子吃饭，照片活动起来，镜头拉开；故事发展到后来，又变成一张凝固的照片……

再次见面，王家卫又有了新的设想：他发现《繁花》的地图插图非常具体，可以从地图开始讲故事，镜头不断地从地图进入，一条街道、一户人

家……

王家卫以往的电影表现的大多是穿旗袍的旧上海女人，而《繁花》中1960 - 1980年代的女性穿的是性别中性的服装，要把肥大的军裤拍出美感，王家卫认为相当有意义。金宇澄说：这是当时的匮乏年代，上海女性对于服装的概念，是低调的显现，小说中的上海时髦女性，只注意衣服的尺寸，只在这上面做文章，在外穿得朴素，回到私密空间，穿戴就不一样了。王家卫说：“私密的城市生活只在上海，也许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很多出自人们的想象。”

2013年《繁花》出版之后，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也有王家卫，他在小说里看到了自己和家人昔日在上海生活的影子：“《繁花》最主要的两个时段——1960年代到‘文革’、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我是空白的，因为我已经移居到香港了。《繁花》里面有很多好像我上海家里发生的事情，我小时候我的表哥、姐姐、哥哥，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一些线索。所以我会感觉一见如故。”

1963年，出生在上海的王家卫跟随父母来到香港，他的哥哥和姐姐则留在了上海，那一年他五岁。小时候，王家卫跟着下班的母亲从武康路的外祖母家走到淮海路，是经久不灭的记忆。电影《花样年华》出现旗袍的场景都采用较低的机位，其实就是童年王家卫仰视母亲和朋友们的视角。王家卫拍《花样年华》是一次重温童年回忆的历程，为了表现出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王家卫自己写上海菜单，如扁尖、笋干，请上海籍的老太太来做。

金宇澄和王家卫两人2013年12月第一次见面商讨合作时，王家卫离得老远就摘下了那副著名的墨镜，金宇澄一下子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陌生人。聊天谈剧本，王家卫都会把墨镜摘下。“标志就是这副墨镜，摘下墨镜，走在上海的街头谁也不会认出他来。”金宇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天正是金宇澄的生日。不一会，桌上就出现了一只蛋糕——王家卫为他准备的。

第二次见面，王家卫不知从哪里找到金宇澄1992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迷夜》，请他签名。王家卫说：“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上海的文学都非常女性。但是金老师的小说充满了男性的荷尔蒙，这种性感不是粗犷，也不是颓废，是一个上海男人的性格。”

金宇澄大王家卫六岁，和王家卫兄姐的年龄相仿，都有着那代人相同的下乡经历，《迷夜》叙述的历史记忆，包括形同荒岛的人生世态、改成知青宿舍的前劳改营，其中一个短篇写到1961年的残酷——劳改队很少的口粮，每天都置放于麦地中央的方桌上，犯人们在一千米之外开始割麦，等

于一场赛跑，第一个割到桌子前的人，就可以随便吃。小说中的人物因为是粤籍，每天吞咽麦田里的幼鼠，才没有被饿死。

“上海人不小气，买房子，我要这两栋”

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阿飞正传》结尾，被金宇澄用作了《繁花》的开头语：“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金宇澄解释：梁在前面的电影里从未出现过，我很佩服这种处理方式。因为一个小说，一部电影，不能都四平八稳的，应该有一个属于作者本人的标识。《阿飞正传》结尾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这就是王导的风格。观众或者读者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干嘛要跑出来？

王家卫则被《繁花》独特的小说语言吸引：“这本书特别牛的地方是方言，不是用简单的上海话，而是把上海话做了改良。”

金宇澄说：“纯粹表现上海话，《繁花》肯定不够格。在《繁花》里没有上海话最常见的‘侬’（沪语‘你’），也没有‘阿拉’（沪语‘我、我们’），如果翻开一本书，都是上海话的陌生常用字，读者就不会喜欢它。”因此金宇澄都做了转换。“我的想法，是要清除方言的障碍，把方言改良到什么人都能懂，文字虽然有变，但是上海人说话的韵味还是保存在里面”。

《繁花》里的“不响”出现了一千多次，这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其实也经过金宇澄的改良。按照标准吴方言话本的写法，是“弗响”，现今因为是“统一普通话教育的大背景”，沿用字典成语“闷声不响”的“不响”才更合适：“我做的工作，是要打开，想方设法吸引非上海籍的读者，并不是传播上海话，而是通过文字语言，让中文读者都能够了解上海人的生活。去年《繁花》得了近三十个奖项，除上海的一个之外，二十九个奖项与排行榜，都是外地颁发的，有那么多外地读者喜欢这本书，已经达到目的了。如果我完全用上海话字正腔圆地写，《繁花》可能也就印五百本吧。”

在对谈中，王家卫明确表示，将会保留《繁花》的语言风格，用上海话拍摄电影：“如果变成普通话，等于《茶馆》里面的京白变成普通话的调子，就没有味道了。”

也曾经有人向王家卫建议：《繁花》里台词都是现成的，只要框架搭好，把台词放进去就行了。王家卫回答：“台词必须重新写，才会更贴切。”

金宇澄不同意外地人对上海人的许多看法。他在外地生活了八年，经常听外地人怎么议论上海，发现，“可能因为上海语言的障碍，造成了对上海

的生活不理解”。比如说，“北方天气非常寒冷，一到秋天每家每户都是买两吨白菜、一吨煤藏在家里。北方人跑到上海同学家里去，看见桌子上面有两根小葱，直接拿起来就吃了，因为北方人吃大葱就直接吃。三根葱，一分钱，太小气了，我们家里一买葱就买三百斤。没想到过一会一个阿婆要做鱼了，到处找葱，他这才搞清楚原来上海人是根本不吃葱的，就是佐料用。再比如，老舍的儿子舒乙，写过几篇文章，说上海人六十年代最小气，其他地方的粮票都是一两二两三两，只有上海发行半两的粮票。实际上，‘文革’时上海一碗馄饨是半两粮票，因为小馄饨是上海人下午吃的。上海很早就有单个买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月饼，一碗小馄饨都是半两。后来去到美国看，也是一个苹果多少钱，一个茄子多少钱，一个辣椒多少钱。”

王家卫听完之后回应：“我想我的观念要改变，因为最近几年我看上海人来香港也不小气，买房子，（张口就是）我要这两栋。”

（本文作者名牌杂志撰稿人 菲丽丝）